

以社會建構主義文化概念 探討兩岸關係發展

著者／葉莉亭

空軍通校女士官83年班
開南大學空運管理所碩士
現為空軍戰術管制中心士官長

兩岸歷史情結，在主權及意識形態之爭，總是無法進行官方的政治談判，結束敵對狀態。這兩條關係路線，時而交錯重疊、時而分裂併行。如何經由社會建構主義理念，從文化認同之內涵，建構兩岸發展之新局，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議題，本研究僅就社會建構主義文化的概念，來探討兩岸關係的發展，期能由此研究獲得兩岸發展在文化上的省思。

壹、前言

兩岸歷史情結，在主權及意識形態之爭，總是無法進行官方的政治談判，結束敵對狀態。這兩條關係路線，時而交錯重疊、時而分裂併行。以「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 來詮釋兩岸關係及因意識形態不同，可適度解釋兩岸在非官方狀態下，在軍事武力對立，但民間交流卻十分熱絡現象。

自1991年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的變

遷，兩極世界「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 轉變為一超多強(一超為美國、多強為歐盟、日本、中國大陸、俄羅斯等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的主流理論，已無法妥適地解釋與預測國際政治。繼之而起的社會建構主義，亦接受新現實主義的主要假設，擺脫「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哲學層面來解釋「國

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謀求一套從經驗上可解釋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變化的理論。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是由觀念構成，文化認同是由不同國家經過互動形成國際共享知識，亦是國際體系中行動者互動的結果，更是制度與規範和預期慣例之總合¹。社會建構主義所要強調的主體概念，也是新現實主義所忽視及不足之處，且能適用於詮釋兩岸關係發展的複雜現象。

「文化」(culture)是一個社會的規範、價值與信念，包含知識、人文、工藝與語言，文化也是一個社會共享、轉化知識系統是既存規範性的物與事，經由人文創設一種表徵²。兩岸文化中以節慶為例：由於同為中華文化的民族所重視節慶都一樣，包含春節、清明節、端午節及中秋節。這四大節慶就是兩岸共同的文化交集，而且証明了中華文化為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角色。透過兩岸人民對彼此共同文化的認知以及文化的價值觀相同產生凝聚力；彼此一定能夠設身處地互相體諒，也才能理解兩岸華人的根本利益和願望。

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民國仍需吸取更多中華文化的精髓，相對中國大陸的人民亦可學習中華民國文化特色。畢竟幾千年中華文化是兩岸人們共有共享的，在互動交流中彼此不會相互排斥。就「溫特」(Alexander Wendt)推演出的三種國際體系言，兩岸是否能順利由「洛克」(Lockean)式文化體系轉變為「康德」(Kantian)式文化結構的國際體系，互為朋友，就要看海峽兩岸未來的努力與發展。

貳、理論探討

一、社會建構主義概念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起於1980年代末因東歐與南歐國家紛紛走向了「資本主義」(Capitalism)，後來擴展到「東德」(East Germany)、「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匈牙利」(Hungary)、「保加利亞」(Bulgaria)、「羅馬尼亞」(Romania)等前「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共產體制的瓦解，最後以蘇聯

(Soviet Union) 解體告終，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問題引起大眾對該主義的探討，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因此，也不可能產生共同結構；雙方一但開始交往，初始行為透過互應機制使互動中雙方產生加強一些觀念，並開始擁有相互主體的共同觀念。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正式透過機制互動觀念產生「認同」(identity)，是一種體系結構³。

二、社會建構主義定義

依照溫特社會建構主義定義：「第一，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位；第二，國家體系的關鍵結構是相互主體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第三，國家認同與利益是由這些社會結構所構成重要部份，而不是由人性或國內政治對國家體系的特定外在因素所構成」⁴。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主要分析單位是國家，國與國之間相互主體構成國際體系，亦決定國家認同與利益，國家與國際體系是相互建構而成⁵。因此，從檢視社會建構主義學者有關的論著將可增進我們對社會

建構主義理論的了解，以下將對五位建構主義學者著作加以檢視。

(一) 無政府狀態

「溫特」(Alexander Wendt) 在其著作「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文章中，藉由對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 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有關無政府及自救的概念，提出一全面有關認同與規範的爭論。雖然國際體系都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間的體系都是一致。

(二) 了解國際政治之改變

克羅威斯基(Kolowiski) 及克雷多奇威爾(Kratochwil) 在「了解國際政治之改變」(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陳述新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及兩德統一等。

1. 新現實主義之「唯物主義」(materialism) 及「理性主義」(rationalism) 無法提出冷戰結束之解釋，因為1989至1991年間，蘇聯及「華沙公約組織」成員並沒有改變。

2. 新現實主義亦無法解釋，美國為何不趁蘇聯弱化，採取有利於己之態勢。

3. 新現實主義也無法解釋，為何法國拒絕組成聯盟來對抗新德國，而德國本身在統一後也未追求「霸權」（hegemony）。當國內行為體之信仰（belief）及認同（identity）改變，國際政治亦隨之產生基本改變。因此，也改變組成政治策略之規則及規範。

（三）國家安全文化

卡特仁斯坦在其著作「國家安全文化」（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中，強調兩項不為國家安全政策注意的因素，為政策的文化制度脈絡及國家、政府、政治行為體認同的建構。他爭論歷史證據迫使我們在毫無任何疑問的認同及規範下放棄國家概念，國家對於自我利益及理性行為者而言，利益必須被界定更勝於發現。規範、認同、文化影響行為者安全政策的重要性，已經由社會建構主義研究途徑獲得證明。

（四）規範構成利益

克羅茲（Klotz）在其著作「規範再構成利益」（Norm Reconstituting Interests）中，藉由檢視美國制裁南非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Africa）博塔（Botha）政權「種族隔離主義」

（Apartheid government）案例，博塔（Botha）拒絕對黑人多數人群做出任何讓步，拒絕釋放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辯稱規範改變行為體之認同、影響行為體之利益然後改變政策⁶。新現實主義因缺乏物質結構之改變，無法解釋1985至1986年間，反種族隔離制裁政策之轉變。這樣的改變，是因規範的形式重視種族平等，迫使美國改變其認同與利益。

（五）建構世界政體

魯奇在其著作「建構世界政體」（Constructing World Polity）中，提出國際政治的兩個法則，管制法則（regulative rules）及制定法則（constitutive rules），前者意指國際機制及制度之建立以約束行為者的行為，而後者代表規範建構行為者的認同及利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t）所提國際機制及制度的概念僅為管制法則並不是制定法則，只有社會建構主義、唯心及唯物因素，建構行為者認同及利益的問題。

三、規範（Norm）概念

規範屬於一種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建構主義者把規範概念定義為「意指對某個特定國家本體作出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⁷。建構主義認為，通過建構而產生出來的行為規範、原則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僅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的具體行為、利益、優先選擇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而且可以幫助行為體理解什麼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以及如何運用合法手段去獲取它們。因此，「社會規範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們創造出行為模式」。在對國際體系變化的認識方面，建構主義不是根據在行為體背後起作用的實力分配和權力結構來看待國際體系，而是認為這個體系是由與規範有關聯的機構所組成。建構主義認為，這些機構使國際社會不斷確立各種規範，並以此調節著各機構的活動和習慣，「國際體系是諸機構的集合體，而且諸機構是由諸規範所組成的實踐活動，當其構成的規範的一部分（或全部）發生改變時，國際體系的基本變化隨之出現」⁸。

四、文化

（一）文化結構

建構主義者認為，「文化」（culture）

不僅影響國家行為的各種動機，也影響國家的基本特質及國家的身份。在國家所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中，所具有的文化或制度的形成國家的身份；文化結構建構是塑造「國家地位」（statehood）或國家身份的來源⁹。

（二）溫特文化分類

1. 國際體系隨文化演變：主張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溫特進一步把文化分類為，霍布斯（Hobbesian）、洛克（Lockean）、康德（Kantian）三種文化分為敵人（enemy）、競爭對手（rival）、與朋友（friend）的觀念¹⁰。行為體可以建構霍布斯文化，也可以分解霍布斯文化，並建立洛克文化。由於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成的，如果行為體的互動實踐發生了變化，觀念隨之變化，國際體系結構也就會發生變化。以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物質力量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的變化，而是「觀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的變化，構成是行為體的共有觀念。從一種無政府文化轉變為另一種無政府文化的關鍵在於哪一種無政府文化佔據國際政治運作的優勢¹¹。

2. 國家客觀利益：國家有四種客觀利益，包括生存、獨立、經濟財富與集體自尊，這四種客觀利益在不同的文化結構下有不同的結果。而隨越來越多體系的成員相互認知為敵人、競爭對手或朋友時，體系結構就會傾斜（tipping）到集體的霍布斯、洛克，或是康德結構¹²。由表2得知，例如，冷戰時的美蘇可以算是「霍布斯式體系」，美國與日本可以視為「洛克」（Lockean）式體系，美國與歐盟間可以歸納為「康德」（Kantian）式體系。

（三）文化國家地位

國家所處的全球或國內環境中，文化結構建構或塑造了基本的國家身份，而這些正是「國家地位」（statehood）或國家身份的特徵。某些建構主義學者，

如「阿米塔夫·阿查里亞」（Amitav Acharya），特別提出文化與歷史因素在就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這些學者認為應理解文化因素對東南亞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例如對主權的概念，也因為如此，強調主權與不干涉內政原則也就逐漸在東協的架構下逐漸制度化；所謂的「東協模式」（ASEAN Mode）：「不干涉內政、不使用武力、一致決、面對面磋商解決爭議，等原則，其背後都與其國內既有的政治文化相關，因而內化成為東協國家彼此交往的依據」¹³。

參、社會建構主義「文化」之探討

一、文化意義

文化是一個社會的規範、價值、信念，而且含涉知識、人文、工藝與語言，文化

表1 文化的特徵

特 徵	內 容
普 遍 性	無論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類團體是沒有文化的。
持 續 性	古人所創造的文化，或多或少總被後人保留起來，且代代相傳，毫無被消滅的跡象。
累 積 性	古人所創造的文化依舊存在，有的則經過後人加以改造，或利用以發明新的，文化的內容於是一代一代的增加。
變 異 性	各時代、各社會的文化在其發展程度和內容各有不同，就同一工具或制度，其功能亦可能因時間和空間之差異而不一致。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表2 建構主義國際體系三模式表

區 分	霍 布 斯 式	洛 克 式	康 德 式
對其他國家 角色認定	敵 人	對 手	朋 友
角 色 對 外 交 認 同 的 影 響	1. 用攻佔他國等改變現狀方法來回應敵人。 2. 基於最壞考慮決策。 3. 相對實力至關重要。 4. 無限使用暴力。	1. 衝突發生與否，國家都要尊重他國主權。 2. 絕對利益。 3. 有限使用暴力。	1. 不能用戰爭或戰爭威脅來解決體系內分歧。 2. 集體團結反抗體系外國家的入侵。
體 系 邏 輯	戰爭狀態導致安全至上→每個國家動用一切手段自保→安全是零和關係。	無政府狀態→國家體系如市場運作→安全相對重要→主權制度形成→均勢體系。	多元安全共同體內，彼此確信，不以武力手段解決爭端，軍事力量含義變化，依靠談判與仲裁來鞏固安全，對外奉行集體安全，團結反對入侵者。
武 力 使 用	追求強大軍事力量	沒有使用限制有限使 用武力 建立聯盟關係	武力是為了對抗安全社群的共同威脅
對 應 的 理 論	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也是一個社會共享的、轉化的知識系統是既存的規範性的物與事，經由人文創設的一種表徵¹⁴。社會建構主義認為，文化環境不單是影響了不同類型國家行為為動機，而且還影響國家的基本特徵，即所謂國家的認同¹⁵。

二、文化對國家的認同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觀念影響國家的認同，由不同的認同出發，造成不同國家界定不同的國家利益與安全取向，這些考量

形成國家安全政策，但這些過程並非單向的，文化環境與社會體系中的成員，其關係是互動的，成員間的行為相互影響，更改變了文化環境。同時，文化環境更是對國際社會結構的所有成員產生影響。所以，社會建構主義並不認為無政府狀態必然帶來國家間以暴力方式來取得生存的最低需求。相反的，國家可以透過不同的互動建構作用，建立不同的國際共享知識，以不同的規範或文化為區別特徵的國際社會，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國家安全利益，約

制國家安全政策選項，造成不同的政策互動¹⁶。

（一）國家做為一個實體，文化環境影響了國家的生存展望（prospect for survival）。

（二）文化環境會隨著時間，改變體系中國家的樣式特徵（modal character of statehood）。

（三）在一個特定的國際關係體系中，文化環境可能造成國家特徵的改變¹⁷。

三、社會構主義國家認同

建構主義基本上是一個身份政治的研究，而身份形成的兩種邏輯包括自然選擇跟文化選擇，所以建構主義者會強調強調社會互動過程中，文化選擇的重要性，而文化選擇是要靠社會習得跟模仿來進行身份的建構。「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是指行為者能夠適應環境中的競爭，且自我再造，否則就被其他更能適應環境的行為體所取代，「文化選擇」（culture selection），意指經由社會學習、模仿或是其他類似的過程將決定行為的因素從個體傳至其他個體，這點意味過程對國際社會的建構有重大意義，文化選

擇有模仿及社會學習等兩種機制¹⁸。

當行為體自我意識到他們認為是成功的行為體時，就會模仿這種成功的行為體，並透過模仿獲得認同及利益，但成功的標準是被共同理解所建構的，而共同理解是依文化環境而發生變化。例如殖民時代認為征服他國即進行海外殖民是光榮與道德的行為。不過，今日相同的行為會被視為不道德且違反國際法，模仿而得的國家認同最好的例證是自由民主及市場經濟制度符合普世價值，所以中華民國走向民主開放而自豪，並由此得到自我認同及正面評價¹⁹。

肆、兩岸關係文化發展

1987年政府開放民眾赴中國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直航2008年7月週末包機啟動以來，從每週370班增加至每週558班，搭載超過730萬人次直接往來兩岸²⁰。兩岸民間交流如此熱絡之際，交流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幾乎遍及所有類別，交流的形式、管道和層次也不斷地擴增及提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逐漸從量變到質變。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影響力的崛起，文化力的影響也相對發生。世界各國開始重視

中華文化，其它諸如好萊塢開始重視中國大陸電影，進行多項合作。為了向世界推廣漢語，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中國大陸設立孔子學院；都是一種文化力上升的跡象。換言之，伴隨經濟力上升的後續影響，即是文化力。

兩岸人民同文同種，有相同的文字、語言，在思想內容與生活表現上都有所傳承與交集，這是兩岸共同的基礎也是共同的財產。兩岸文化具有悠久及豐富的意涵，因而展現出強大的包容力與滲透力，是不容任何政黨用政治手段改變與破壞的。當然，文化領域的合作，得受到兩岸當地法令的限制，但這種種侷限，卻因兩岸同時都重視「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而有了全新的可能性。

一、兩岸文化議題的崛起

兩岸歷史文化一脈相承，在當前較為成熟的市場條件下，兩岸可以整合文化資源，以提昇華人文藝市場競爭力。2008年12月31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提出了「胡六點」的主張，其中「第三點」提到「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並認

為中華民國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另提到兩岸可以協商簽訂「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外，已於2010年完成簽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2010年3月5日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發表「拓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²¹。

事實上，兩岸的文化根基都是中華文化，中華民國文化與中國大陸文化都有相同的歷史淵源，兩岸這樣的「相互依存」（control mutuality）度與互賴增加，成了當前兩岸民間經濟文化交往日趨密切的堅厚基石。

中華民國在傳統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的展現、創新能力、文化產業商品化等方面具有優勢，大陸腹地廣大、資源豐沛，文化政策及文藝整合能力較強。以中華民國的觀點來看未來兩岸交流關係，內部對於目前兩岸之間的交流過於密切也產生了許多不同的聲音，尤其是當前兩岸關係的進展，因此若能從兩岸共通的「文化議

題」著手來促進彼此的交流，那麼勢必可以化解交往過程中的各種阻力²²。

二、兩岸文化發展中的角色

（一）兩岸音樂發展

在中國大陸1979年，被中國大陸視為「敵台」的「中央廣播電台」開辦「鄧麗君時間」的節目，透過電台廣播向中國大陸聽眾介紹鄧麗君歌曲。此時正值中國大陸的「解凍」時期，官方默許鄧麗君在民間的私下流行。而在公開管道，鄧麗君則被列入絕對禁止的範圍。在中華民國，校園吹起民歌運動前，中華民國年輕人有時間就唱美國歌；逐漸地人們開始反省，展開「唱自己的歌」風潮，希望承繼中國大陸傳統而非完全美國化。隨著兩岸音樂交流日趨緊密，兩岸各層面音樂往來絡繹於途。例如2013年大國大陸的音樂選秀成為近來最叫座的電視節目，由「中國好聲音」到「我是歌手」，都投下巨額的製作，精善了節目的舞台效果，讓觀眾瘋狂，中華國民眾先透過網站觀看，引起轟動後，媒體跟進報道，電視台也轉播之，收視率屢創新高。不但發掘或翻紅許

多明星、帶動周邊商機，更促使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的娛樂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中華民國擁有厚實的文化底蘊，具備帶動全球華語流行音樂新風潮的動力。中國大陸有廣大流行音樂消費市場，海峽兩岸基於同文同種淵源，具有再創華語流行音樂的新高峰的絕對優勢。

（二）兩岸華人節慶

中華文化中的節慶日，包括過年、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仍然是兩岸共同的文化交集，這就充分証明了中華文化做為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角色。只有透過兩岸人民對彼此共同文化的認同，才能夠相互理解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畢竟兩岸之間僅限非官方（非政府組織）下交流，中華文化所以能夠源遠流長，除了因為其博大精深之外，也在於中華文化能「與時俱進」在融合中展現其「創新發展」。

（三）兩岸文化精髓

兩岸文教交流已由初步試探性、局部性的接觸，發展到現階段實質性、多元性的交流，不論深度或廣度都有相當的提升，中華民國文化固然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傳承，但在中華民國落地深根之後也發展出

了自己的內涵與特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中華民國多元、開放與民主。兩岸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中華民國需要更多的再次吸取中華文化的精髓，而中國大陸也有必要來欣賞甚至學習中華民國文化中的這些特色。這樣兩岸的文化交流將替中華文化的再發展開創更美好的明天；另兩岸關係的契機，需要雙方共同的努力灌溉，以「務實、對等、開放、雙贏」的原則步步為營，現階段除了兩岸共同需要的經貿關係正常化之外，更要加強文化之間的交流，畢竟中華文化是兩岸所共有共享的，而當兩岸在互動交流中共蒙其利，情感友誼有所增進，彼此不再相互排斥，兩岸關係就能提昇到更高層次的領域，替未來的和平穩定建立起紮實基礎。

伍、結論

建構主義強調體系文化演進的動力是成員與結構間之互動，對國際政治的「綜合性安全觀」（comprehensive security），除了「傳統安全」（traditional security）與「非傳統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安

全威脅外，應是含括任何一種安全的內涵，且都是對應當前國際社會的脈絡，並受到能動者與結構互動所形塑的。此外，共同合作面對與解決第三方的威脅，顯見體系文化已能夠接受由利己轉為互利共生。

文化與認同等意識的綜合審視，並與他者及結構不斷的產生互動，使得安全的內涵也不斷的演變。也就是說，每一種安全都有其特定的結構，它不是既定的概念，而是一種互動的成果。兩岸藉由充分與國際規範接軌，定義了這個文化體系的特質，以建構主義之國家思維，建立兩岸在文化上的認同，化解歧見，消弭衝突，促成合作，共創雙贏，確實是值得期待及努力。

隨著兩岸關係逐漸解凍，民間交流如此熱絡，交流涉及的範圍廣泛，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進入新的互動階段。就無政府狀態而言，在前一時期兩岸關係仍處於霍布斯文化，但在2008年至2010年間則轉換成洛克式文化體系；另馬總統上任後，積極恢復與中國大陸中斷10年的協商，以和平為兩岸政策訴求軸心，兩岸交流常態化已

有具體的成果，形同逐步邁向「朋友」關係之路，符合溫特推演出的三種國際體系，但是否能順利由洛克式文化體系轉換為康德式文化結構的國際體系，就要看海峽兩岸未來的努力與發展。



- 16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7年，頁297。
- 17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7年，頁297。
- 18 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Spring 1994), p. 216.
- 19 張亞中，《國際關係理論》（揚智文化），2009年，頁95-97。
- 20 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tslj/jjss/2011/02/2290053.html> (檢索日期2012.03.27.)
- 21 http://big5.taiwan.cn/xwzx/bwzx/201003/t20100305_1273507.htm (檢索日期2014年1月11日)
- 22 朱新民〈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第五屆兩岸文化論壇》<http://nfp.org.tw/post/12/6236> (檢索日期2014年1月11日)

參考資料

一般書籍

- 1 包宗合等，《國際關係辭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3月。
- 2 江春琦，《國際關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
- 3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4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 5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 6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 7 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生智文化），2000年。
- 8 張亞中，《歐盟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國際關係研究叢書》，（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2006年10月。

學術論文

- 1 朱新民〈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第五屆兩岸文化論壇》。
- 2 陳曉航〈從建構主義觀點論兩岸衝突與合作之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3 盧業中，〈東協區域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2期，2004年。
- 4 賴炳良，〈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溫特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3月。

英文文獻

- 1 Alexander E.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demational State*.
- 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網頁資料

- 1 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 2 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
- 3 陸委會<http://www.mac.gov.tw/mp.asp?mp=1>

- 1 張亞中，《國際關係理論》（揚智文化），2009年，頁100。
- 2 陳曉航〈從建構主義觀點論兩岸衝突與合作之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197。
- 3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頁231-264。
- 4 Alexander E.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demational State*) p.385
- 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7年，頁297。
- 6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頁231-264。
- 7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7-23..
- 8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3年，頁295-296。
- 9 Alexander Wendt, "On Constitution and Caus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im Dunne et al.,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19-19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27-53.
- 10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op.cit., p. 391.
- 1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BA%E6%9E%84%E4%B8%BB%E4%B9%89%E7%9A%84%E5%9B%BD%E9%99%85%E5%85%B3%E7%B3%BB%E7%90%86%E8%AE%BA> (檢索日期2014年1月11日)
- 12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p.cit., pp. 264-312.
- 13 盧業中，〈東協區域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2期，2004年，頁94。
- 14 陳曉航〈從建構主義觀點論兩岸衝突與合作之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2007年，頁197。
- 1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7年，頁297。